

【特稿】

译者说明:2012 年 9 月 18 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应邀到南京农业大学作题为《解读中国经济》的学术报告。林教授兼任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此次学术报告既是南京农业大学 110 周年校庆活动重大内容之一,也是经济管理学院名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一。

精彩的学术报告获得了广大师生的热烈反响。为了进一步传播林毅夫教授的学术思想,主办方根据报告录音整理了一份记录稿,希望经林教授审定后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林教授提出,由于报告的内容主要取自收集在邹至庄主编的《Handbook on Chinese Economy》一书中(尚未出版),建议我们直接把该文翻译成中文发表。我们欣然接受林毅夫教授的建议,十分感谢林教授对南京农业大学和本刊的支持。

本文经作者本人校订、增补。

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2-0010-01

在 18 世纪以前的 1000 多年时间里,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即使到了 19 世纪,中国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 Angus Maddison 的计算,18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见图 1)。但是,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迅速崛起,中国经济的相对地位则直线下降;随着经济的衰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屡战屡败,并沦为半殖民地,20 个国家在中国设有租界,获得了各种治外法权,中国的海关收入被外国人控制,而且还被迫割让领土给英国、日本和俄罗斯。

鸦片战争以后,历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社会精英,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抛头颅、洒热血,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不懈努力,力图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但数代人的努力收效甚微。中国

GDP 在世界的份额到上世纪 50 年代缩减为全球 5%,并且长期滞留在这一水平,直至 1979 年(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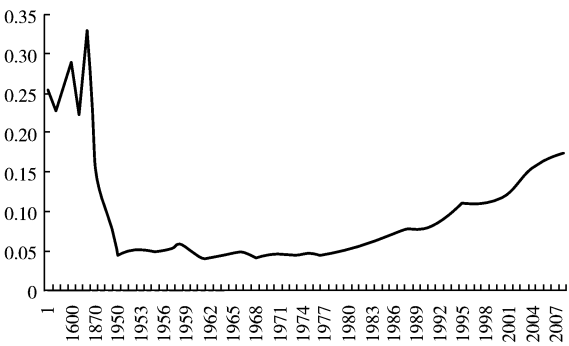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 GDP 占全球经济的份额
数据来源:Maddison, 2010.

收稿日期:2013-01-21

作者简介:林毅夫,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 本文主要观点取自 Lin(2012a):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该书的中文版为《解读中国经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2 年出版。原稿用英文写成,将作为 Gregory Chow 和 Dwight Perkins 主编的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Economy 的一章。本文中文由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翻译,内容经由作者校订、增补。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迅速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命运。从那时开始,中国经济取得奇迹般的增长,1979—1990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9%^①。90年代初开始,不断有学者认为中国缺乏根本性的改革,经济不可能再高速增长下去^②;然而,1991—2011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却进一步上升到10.4%。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为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之奇迹,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其它转型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更形成鲜明对照。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优异成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197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GDP的份额还只是可怜的0.98%,而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GDP占全球的份额就上升到8.4%。

1979年中国属于世界上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按照2000年不变价计算人均收入仅175美元,还不到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激增到6000美元,超过撒哈拉以南国家人均收入的四倍。中国经济的杰出表现帮助六亿多人脱离了世界银行所定的人均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水平。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是一个极端内向的经济,外贸依存度(外贸占GDP比重)仅为9.7%。按照美元现价计算,1979—2011年期间中国外贸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6.3%,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进出口总量占全球贸易量的8.4%,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在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

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张的背后是迅速的结构转型,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农业国,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31.3%的GDP来源于第一产业;到了201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48.7%和10.1%。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贸易中:1980年中国出口商品的50.3%来自于农产品,而现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高达95%。

贸易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外汇储备的高速积累。199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仅为111亿美元,只能勉强维持两个半月的进口需要;而现在这一数字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中国的强劲增长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中

国经济战胜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并维持了高速增长。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决定帮助东亚其他经济体避免了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为遭受金融风暴的东亚经济体的迅速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中国经济在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鹤立鸡群的高速增长也是全球复苏的重要拉动力量。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即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想到^③。

为了回答在保持了30多年奇迹式的增长之后,中国是否还有可能,以及如何才能再维持高速增长,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到建国100周年时将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本文将分析、回答下列5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能够长期维持这么高速增长?第二,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未能取得类似成就?第三,为什么大多数转型经济体,包括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取得同样成绩?第四,中国为过去30多年的超常成就付出了什么代价?第五,未来数十年中国是否能保持高速增长?为提升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本文最后将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对中国未来发展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 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是现代才有的现象。例如Angus Maddison(2001)和其他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18世纪以前西方世界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05%;这一数字在19世纪急剧上升到1%,接着在20世纪达到2%。这意味着欧洲人均收入翻一番在18世纪以前需要1400年,在19世纪需要70年,再以后则只需要35年。

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人均收入的持续增

①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中关于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均取自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不同年份)。

② Gordon H. Chang的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Random House出版,2001年)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之一。

③ 邓小平的初始目标是在20年内让中国经济翻两番,即平均每年增长7.2%。上世纪80年代,甚至晚到90年代初期,大多数数人仍然认为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长都是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取得的结果(Lin, 2012b)。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的急剧加速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范式变化的结果。18世纪以前,技术创新的源泉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日常工作中的经验积累和偶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经验基础上的创新越来越快地首先被有目的的试验所取代,紧接着被实验室里进行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所取代(Lin, 1995; Landes, 1998)。创新范式的转变加快了技术创新的速度,迎来了现代的经济快速增长并导致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国家人均收入的加速增长(Kuznets, 1966)。

工业革命不仅加快了技术创新的速度,而且改变了产业、经济和社会结构。18世纪以前所有国家都是农业国,85%甚至更多劳动力从事农业,其中大多数从事家庭自给自足的生产。经济增长的加速伴随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从初始阶段的高度劳动密集行业逐步转向资金密集的重工业和高科技行业;直到最终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生产规模、资金需求、市场范围和风险也在扩大。为了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产业提供的潜力,也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和风险,不仅需要硬的基础设施(例如电力和道路系统)的创新和改善,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软的基础设施,也就是各种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包括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信仰、价值、法律、金融体系以及教育等方方面面(Lewis, 1954; Kuznets, 1966; North, 1981; Lin, 2011)。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追求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方面具有后发优势(Gerschenkron, 1962; World Bank, 2008)。因为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的高收入先进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研发领域充满风险的巨额投资。此外,实现新技术和新产业潜力的制度创新通常要经过漫长的试错过程,具有路径依赖和渐进的特征(Fei and Ranis, 1997)。作为对照,后来者在追赶过程中可以借鉴先发国家的技术、产业和制度,技术、产业、制度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都低得多。因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知道如何恰当利用技术、产业以及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其年均增长速度完全有可能在数十年时间内数倍于高收入国家,直至与后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幅度。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在25年或更长时期内保持7%或更高年均增长率的

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Michael Spence 领导的成长与发展委员会发现,这13个经济体具有5个共同特征,其中第一个就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潜力的能力。用该委员会的话来说,就是这13个经济体能够“输入外部世界已知的东西,同时输出外部世界需要的东西”(World Bank, 2008)^①。

1979年邓小平开启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中国采用开放战略,开始释放“输入世界已知的东西、输出世界需要的东西”所蕴含的潜能,从而成为这13个成功经济体中的一员。这一过程体现为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和贸易依存度的急剧提高。1979年中国出口产品中75%以上是初级产品或初级产品的简单加工品;而现在制造业产品占了出口贸易的95%以上。此外,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从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简单玩具、纺织品及其它廉价产品升级为本世纪的高价值、技术复杂的机械、信息和通讯科技产品。利用后发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且因为节约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转型方面的成本而取得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Lin, 2012a)。

二、为什么1979年以前中国未能取得高速增长

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前很久中国就已经具有上述后发优势。1949年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政府在1953年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为什么中国在1979年以前没有能够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来取得高速增长?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的发展战略。

在前现代时期中国不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精英一样,毛泽东、周恩来和第一代革命的其他领导人也被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理想所鼓舞。

工业化的阙如,特别是缺乏构成军事和经济力量基础的大型重工业,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很自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在革命后把优先发展先进的大型重工业作为使中国

^① 其余四个共同特征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市场体制;以及有决心、有能力并且可以信任的政府。Lin and Monga(2010)指出,五个共同特征的前三个是不同发展阶段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的结果,而后两个特征则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的前提条件。

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切入点^①。受英国不断增强的工业力量和本国工业的落后状态之间巨大反差的刺激,19世纪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事实上也遵循了同样的战略(Gerschenkron, 1962; Chang, 2003)。

自1953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以加速建设先进的现代工业,目标是10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由于发达国家在先进技术和产业上的专利保护甚至技术封锁,这种迎头赶上的战略使得中国放弃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利用后发优势的可能。而且,中国当时还是一个低收入的农业国,83.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美国的4.8%(Maddison, 2001)。在既定就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发展高收入国家先进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因而中国建立的同类企业不具有在开放、竞争市场上的自生能力^②。

为了实现既定战略目标,中国政府必须保护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不仅给予相关企业垄断地位,而且通过压低利率、进口商品汇率和要素价格等扭曲价格的方式实行补贴。价格的扭曲必然导致供应短缺,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动员资源并直接配置给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Lin, 2009; Lin and Li, 2009)。

通过这些干预措施,中国很快建立了先进的现代产业,并在上世纪60年代成功试验核武器、70年代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但是,工人、农民的积极性被抑制,资源配置不当,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经济效率因而低下,1979年以前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要素投入的增加^③。尽管中国GDP在1952—1978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6.1%,并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大型现代工业体系,但是,到改革开放开始的1979年,从就业结构上看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71.3%的劳动力仍然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1952—1978年期间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仅仅为2.3%,而1979年以后则高达7.1%。

三、为什么其它转型经济没有取得同样成绩

二次大战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与中国相同的发展战略。上世纪

50年代以后大多数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新独立国家人均收入非常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入学率很低,基础设施极端缺乏。它们通常仅仅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同时进口工业制成品。发展先进的现代工业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快速起飞、避免依赖西方工业强国和消除贫困的唯一途径(Prebisch, 1950)。

上世纪5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流行进口替代战略,以便在本国加速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工业(Lal and Mynt, 1996; Lin, 2012c)。然而,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违反了低收入农业经济体国内资源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了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的扭曲和干预措施^④。这一战略使得这些国家可以建立某些现代产业,并且在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取得一段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然而,无论什么情况下,上述扭曲必然造成普遍的软预算约束、寻租和资源配置错位(Lin and Tan, 1999),经济效率低下不可避免。到70至80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被经济停滞和经常性的社会经济危机所困扰,因而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一种趋势。

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经济危机,所有这些症状及其根源——政府的干预和扭曲政策,是中国、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体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现象。但是,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和决策界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扭曲实际上是在条件限制下的次优选择,内生于保护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优先发展产业

① 中国发展重工业的愿望远在社会主义精英获得政治权利之前就存在。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1919年在他的《建国大纲》中就提出了优先发展“关键和基础工业”的设想(Sun, 1929)。

② 尽管19世纪后期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目标与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目标相似,但前者当时的收入水平要高很多:人均收入已经相当英国水平的60%~75%。人均收入差距很小,说明这3个国家政府选定优先发展的产业已经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Lin and Monga, 2011)。

③ 根据Perkins and Rawski (2008)估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952—1978年期间为0.5%,而1978—2005年期间上升到3.8%。

④ 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扭曲有一些不同解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5)、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以及Grossman and Helpman (1996)认为这些扭曲背后的原因是政府被强有力的利益集团绑架;Lin (2012a, 2009 and 2003)和Lin and Li (2009)则认为上述扭曲是这些国家比较优势与优先发展的产业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而优先产业的选定则是政治精英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为实现本国现代化而做出的选择。

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因此,他们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休克疗法立刻取消全部扭曲,全面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以便尽快获得高效率的资源最优配置(Lin,2009)。

然而,一旦立刻彻底取消这些扭曲,优先发展领域中许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将破产,从而导致经济崩溃、失业率飞升和强烈的社会动荡。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灾难,许多政府不得不采用伪装的、效率更低的其它补贴和保护措施来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Lin and Tan,1999),其结果是这些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甚至还不如60—70年代(Easterly,2001)。

在转型过程中,中国遵循了务实和渐进的双轨制途径。通过赋予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生产者剩余索取权,同时允许他们按照固定价格和数量完成上交任务后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剩余产品,由此,中国政府首先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并因而提高了生产力(Lin,1992;Lin,2012a)。与此同时,政府继续向优先发展产业中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必要的保护;并且向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开放劳动密集部门。中国在这些部门具有比较优势,但其发展在转型以前却遭到严重压制。由于采用这样的转型战略,中国避免了过去优先发展行业的崩溃从而保持了经济和社会

的稳定,同时又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发展新产业取得高速增长的成就。通过这种渐进式的双轨制途径,中国实现了“没有受损者的改革”(Lau, Qian and Roland, 2000; Lin, Cai and Li, 2003; Naughton, 1995),逐步、稳定走向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

另外还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①、斯洛文尼亚和越南,在转型过程中也采取了类似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战略,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Lin,2009)。毛里求斯上世纪70年代采取类似措施以改革进口替代战略导致的扭曲,同样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的目标,成为非洲的成功典范(Subramanian and Roy,2003)^②。

四、中国为成功付出了什么代价

渐进式双轨制转型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这一途径帮助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维持了令人羡慕的稳定和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它又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消费与储蓄以及国际收支方面的失衡^③。1979年转型开始之时中国社会相对平等;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增长到2008年的0.47(Ravall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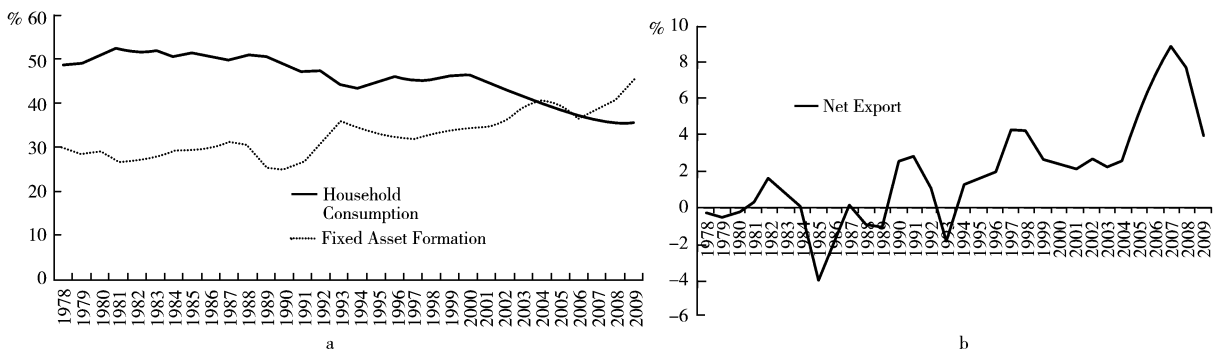


图2 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

① 波兰在转型之初虽然请了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为其设计方案,但是,实际上并未完全推行,其大型国有企业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尚未私有化。

② 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匈牙利和波兰曾经实施渐进式改革。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不允许国有企业完成固定的上交任务后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私人企业进入那些发展受压制的部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与此相反,工资却放开了(中国的工资水平则受国家管制)。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工资通胀和恶性短缺。关于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渐进式改革差异的讨论可参见 Lin, 2009。

③ 今天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环境退化和缺乏社会保障,是发展中国家共有的问题;本文集中讨论中国双轨制转型引发的若干重大问题。Brandt and Rawski(2008)共同主编的书中提供了关于中国发展和转型其它问题的出色讨论。

and Chen, 2010)。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50% 下降到 35%, 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则从 30% 上升到 45% (参见图 2a); 而净出口占 GDP 的份额则从几乎为零增长到 2007 年的 8.8% (参见图 2b)。这些失衡状况就是双轨制转型的副产物。

中国政府在转型过程中保留了某些扭曲措施, 以便保护那些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时期建立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 (参见第三部分)。保留的主要扭曲措施包括金融服务集中于四大国有银行和资本市场、自然资源几乎无偿使用, 以及主要服务业包括电讯、电力和银行业的垄断^①。

上面提到的扭曲措施有利于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稳定, 但也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 以及经济中的其他失衡现象。因为只有大企业和富人才能获得大银行提供的信贷服务, 并且利息率被人为压得很低, 其结果是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相对贫穷的存款者补贴大企业和富人; 资本市场的运行结果也一样。利润和财富向大企业集中, 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都是不可避免的。过低的自然资源税和服务业的垄断也有同样的后果。

一般来说, 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家庭。因此, 如果财富超比例集中于富裕家庭, 全国的消费率就会相对较低, 而储蓄率则相对较高。财富集中于大企业会产生同样结果。如图 3 所示, 这种收入分配模式的结果必然是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和非常高的企业储蓄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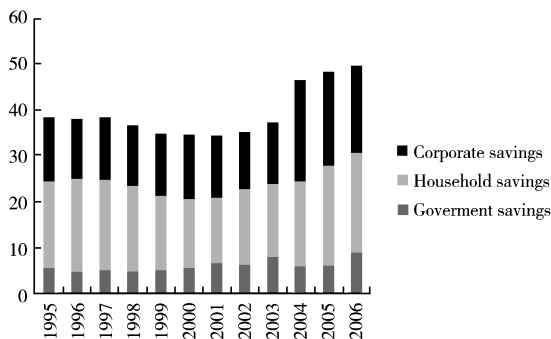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企业、居民和政府储蓄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98—2009

居民和企业的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和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 由于低消费率限制了国内需求, 大量贸易盈余自然而然积累起来; 这些扭曲也创造了大量的租金, 诱发了企业的寻租行为和政府的腐

败之风。因此, 中国必须取消金融领域、自然资源和服务行业仍然存在的扭曲措施, 才能纠正上述失衡现象, 最终完成向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转型。必要的改革包括: 一是消除金融抑制, 允许发展包括地方银行在内的小型地方金融机构, 以增加金融服务, 特别是对农户和中小型的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的贷款; 二是改革退休金制度, 消除国有采矿企业的退休金负担, 以便征收适当的资源税费; 三是鼓励电讯、电力和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和竞争。

五、未来数十年中国是否能保持高速增长

除了中国以外在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超过 30 年的时间里保持 9% 的年均增长率。中国是否有再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 20 年或更长时间的潜力? 对此问题答案的关键是到底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多大的后发优势。Maddison 利用购买力平价估算出 2008 年中国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美国的 21%^②。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技术、产业和制度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差距。

根据 Maddison 的计算表明, 中国在 2008 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 相当于 1951 年的日本、1967 年的新加坡、1975 年的中国台湾和 1977 年的韩国和美国的差距。日本 1951—1971 年期间 GDP 年均增长 9.2%, 新加坡 1967—1987 年期间 GDP 年均增长 8.6%, 中国台湾 1975—1995 年期间 GDP 年均增长 8.3%, 韩国 1977—1997 年期间 GDP 年均增长 7.6%。1979 年以后中国采用了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同的发展战略, 因此, 从后发优

① 转型以前, 国有企业直接从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中无偿获取投资和运行所需资金。上世纪 80 年代初, 财政拨款逐渐被银行贷款取代, 四大国有银行开始发挥作用, 以后又发展了资本市场。资金价格被人为压低到极低水平以便补贴国有企业, 自然资源的价格也被压低到极低水平以便降低重工业的投入成本, 而采矿企业的资源税则被豁免。转型以后, 90 年代初期自然资源的价格放开了, 但资源税依然很低, 用以补偿国有采矿企业大量退休老职工的养老支出。然而, 80 年代以后建立的私营和合资企业并没有类似的养老负担, 资源税过低等于把自然资源的租金从政府手中直接转移给这些企业, 让他们获取暴利。转型以前给予电讯行业垄断地位的理由是他们提供公共产品并且投入了大量资本; 转型以后, 伴随着高速增长和资本积累, 资本不再成为制约因素, 但中国政府仍然允许这些企业享受垄断租金 (Lin, 2012a; Lin, Cai and Li, 2003)。

② 本部分中的统计数字取自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势的观点出发,中国具有在今后20年继续实现年均8%的高增长率的潜力。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71年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5.6%,1987年新加坡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3.8%,1995年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4.2%,而1997年韩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0.2%。如果中国实现了上述潜在可能,20年以后中国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可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5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依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而定,中国经济总量至少也与美国相当。

许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可能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充分实现上述增长潜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已经面临许多前所未见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1) 不断扩大的收入和城乡差距

中国始于1979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农民收入增长快速,城乡差距和中、东、西部的地区差距都在缩小;但是,1985年以后这些差距开始扩大。基尼系数(测度收入不平等状态的指数,绝对平等时其数值等于0,绝对不平等时等于1)从1981年的0.31增加到2005年的0.42,接近拉美国家的水平(World Bank, 2010)。孔夫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确实,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在低收入人群中引起强烈的不满。此外,城乡之间的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等公共服务的发展也严重不平均。因此,收入和城乡差距扩大可能加剧紧张和对立,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

(2) 资源利用低效和环境失衡

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消耗了大量能源和资源。2006年,中国生产了全球GDP的5.5%,消耗的石油占全球的9%,铝占23%,铁占28%,煤占38%,水泥占48%。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如果中国不改变增长方式、不减少资源消耗,其外部效应将在数代人的时间里给其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上升的资源价格将增加过度消费的成本,因而与科学发展观相抵触。

这种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很严重。近年来矿难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就是环境恶化的证据。自然灾害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害,因而保护环境、预防灾害在中国同样至关重要。

(3) 外部失衡与货币升值

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盈余。2005年以前经常项目盈余数额并不大,但2007年剧增到相当于当年GDP的7.6%。长期大量贸易盈余的结果导致外汇储备迅速积累,超过3万亿美元储备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

在中国外贸盈余迅速积累的同时,美国的外贸赤字却快速上升,并且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就引起了广泛注意。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伯格斯特(C. Fred Bergsten)2007年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全球经济失衡可能是当前美国和世界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面临的最大单一威胁”(Bergsten, 2007)。在整个危机期间一直有许多人声称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应当完全或部分归因于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一些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指责估值偏低的人民币导致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由此产生的中国外汇盈余被用于购买美国债券,此举又压低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利率并进一步引发美国资本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从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Krugman, 2009; 2010);另一些人则声称人民币升值以平衡中美贸易是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前提条件(Goldstein, 2010)^①。

(4) 腐败

改革以前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很容易发现和预防腐败;改革以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工具,收入来源极大地多样化,许多灰色和黑色收入很难被察觉。不断蔓延的官员腐败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从而进一步引发利益受损人群的愤懑并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很难在重大危机面前保持社会凝聚力,经济和社会稳定必然受到严重伤害。

(5) 教育

中国的教育过度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不利于培养劳动者的素质,也不利于长期社会发展。无论是从国外引进还是通过国内研发,各种形式的技术创新都依赖人才;而没有好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创新。

教育领域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障碍。社会保障

^① 上述说法其实是片面之词,造成2001年以后美国贸易赤字激增和房地产泡沫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金融自由化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和美联储为了避免互联网泡沫破灭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实行的低利率政策(Lin 2013)。

体系发展滞后、技术水平低下、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其它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乃至外部失衡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动荡。如果不能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后发优势所给予中国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中国必须消除双轨制改革时期遗留的各种扭曲,完成向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转型,同时消除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其它社会、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障碍。

结论:过去的经验对中国未来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从中国过去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什么有益的经验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只要了解如何根据本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方面的后发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机会加速经济增长,中国也有可能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家庭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在建国100周年时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

运行良好的市场是一个国家根据比较优势发展相关产业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能通过价格信号反映本国生产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这样的市场自然会引导企业进入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部门。如果遵循本国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就可以更快增长、积累资本和升级禀赋结构。一旦禀赋结构升级,比较优势必然相应变化;产业结构和软、硬件基础设施都必须相应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作用,特别是补偿产业升级先行企业创造的外部性,协调或提供个别企业的决策无法内部化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改进。一旦竞争性的市场运行良好,政府也发挥了积极的因势利导作用,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并获得快速增长(Lin,2011)。

由于以往发展战略造成的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扭曲,许多现存企业在公开

竞争的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在这一方面,中国过去30多年的转型经历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改革过程中比较适当的做法是首先消除对农民、工人生产积极性方面的抑制以提高生产率,同时用双轨制的办法对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过渡性的保护以维持稳定,但必须开放本国具有比较优势行业和部门的市场准入,这样就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并充分利用本国的后发优势。中国能做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有可能维持稳定并实现高速增长。

30年前无法想象中国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并成为维持25年年均增长7%以上的13个经济体之一。对于那些力图根除贫困并缩小与高收入国家差距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借鉴中国的转型和发展经验可以帮助他们成为在25年或更长时期实现7%或更高年均增长率的国家之一。

参考文献:

- [1] Acemoglu, D., S. Johnson, J. A. Robinson. 2005.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A, ed. P. Aghion and S. N. Durlauf, 385-472. Amsterdam: Elsevier.
- [2] Bergsten, C. F.. 2007. "Currency Misalignments and the U. S. Economy," Statement before the U. S. Congress, May 9 2007. (http://www.sasft.org/Content/ContentGroups/PublicPolicy2/ChinaFocus/pp_china_bergsten_tstmny.pdf).
- [3] Brandt L., T. G. Rawski, eds. 2008.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 Chang, H.. 2003.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 [5] Easterly, W.. 2001.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6] Engerman, S. L., K. L. Sokoloff. 1997. "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d. S. Haber, 260-30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Fei, J., G. Ranis. 1997.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Malden, MA: Blackwell.
- [8]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9] Goldstein, M. . 2010. "Confronting Asset Bubbles, Too Big to Fail, and Beggar-thy-Neighbor Exchange Rate Policies." Paper based on remarks delivered on December 15, 2009, at the workshop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Looking to the Future, Lessons from the Past" sponso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UK Economic and Research Council,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 [10] Grossman, G. M. , E. Helpman. . 1996.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3(2):265-86.
- [11] Chang, G. H. . 20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b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2] Krugman, P. . 2009. "World Out of Balan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09.
- [13] ——. 2010. "Chinese New Yea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2010.
- [14] Kuznets S. .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5] Lal, D. , H. Mynt.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6] Landes, D. .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 [17] Lau, L. J. , Y. Qian, G. Roland. 2000.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1):120-43.
- [18] Lewis, W. A. .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2):139-91.
- [19] Lin, J. Y. .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1):34-51.
- [20] ——. 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3(2):269-92.
- [21] ——. 2003.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3(2):277-308.
- [22] ——.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3] ——. 2011.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2):193-221 (included in Lin, 2012b).
- [24] ——. 2012a.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5] ——. 2012b.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6] ——. 2012c. *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Take Off*.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7] ——. 2013. *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8] Lin, J. Y. , F. Li. 2009.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Distor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90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9] Lin, J. Y. , C. Monga. 2010. "The Growth Report and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33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included in Lin 2012b).
- [30] ——. 2011.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9(3): (included in Lin 2012b).
- [31] Lin, J. Y. , G. Tan.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426-31.
- [32] Lin, J. Y. , F. Cai, Z. Li. 2003.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SAR, China: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33] Maddison, A. .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 [34] ——. 2007.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960 - 2030 AD*.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 [35] ——. 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 -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
- [36] Naughton, B. .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7] North, D. .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38] Perkins, D. H. , T. G. Rawski. 2008. "Forecas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2025." In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 L. Brandt and T. G. Rawski, 82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9] Prebisch, R. .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Reprinted in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7, no. 1 (1962):1-22.
- [40] Ravallion Martin, Shaohua Chen. 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 Economics,82(1):1-42.
- [41] Subramanian, A. , D. Roy. 2003. “Who Can Explain the Mauritian Miracle? Mede, Romer, Sachs, or Rodrik?” In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ed. D. Rodrik, 205-4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42] Sun, Y. S. . 1929.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Shih yeh chi hua). 2nd e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 [43] World Bank (on behalf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44]——. 201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45]——. 201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1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46] 国家统计局. 2012. 中国统计摘要 2012,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47]——. 2010.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48]——. 1991. 中国统计年鉴 199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责任编辑: 宋雪飞)